

佟辉◎著

智道

节令

节令
智道



「察天定时 物候之行」

中国古代的节令智道文化，由年节文化和时令文化两部分组成，它是集生产、祭祀、娱乐、礼仪、教化、传艺、竞技、享用、养生于一体的文化传承。



中国古代 智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节日

智道

佟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节令智道/佟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2.4

(中国古代智道丛书/王熹主编)

ISBN 978-7-5087-3985-4

I. ①节… II. ①佟… III. ①节令—风俗习惯—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9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1202 号

节令智道

丛 书 名: 中国古代智道丛书

主 编: 王 熹

著 者: 佟 辉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编辑部: (010) 66063028

发行部: (010) 66085300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邮购部: (010) 660610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35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中国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文献典籍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度，国人以此为荣耀和骄傲。我们的先人怀着对中国历史发展无比崇敬的热忱，特别注重对历史过程的探索，注重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及借镜。他们以继承和发展、开拓与创新为重，以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不顾身家安危，敢于向皇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直面千夫指，捍卫了历史的尊严与神圣，载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科学的内涵，进而使我们拥有了二十五史、地方志、实录、文集等林林总总、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继往开来、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国家提供了科学依据。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否则就是荒谬；现实是需要面对的，否则就是逃避，而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恰恰就是文化与智慧。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动力的源泉，使我们懂得伟大源自平凡，崇高源自执着，魅力源自孤独，成功源自独创，生存源自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将历史研究与认识国情、建设新中国紧密联系，赋予历史科学新的生命活力，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发展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像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蔡美彪等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中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普及教育的历史著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使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有了传人和继承者，这是祖宗的恩赐，更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冀盼和厚望。正是在先辈的感召和谆谆教诲下，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因应广西教育出版社江淳女士、李人凡先生的要求，将各自在史学研究领域，钻研积累的个人心得认识贡献出来，由涓涓细流汇集为《中国古代智道丛书》系列出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赢得了读者的赞赏。这说明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





力，它是推动历史、现实，更是推动未来向前发展的动力。

回首往事，斗换星移，当年的年轻学者如今有的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的是科研部门的骨干力量；往昔出版社的独具慧眼，使我们能够捷足先登，得以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睿智，获得社会和世人的认同，的确幸莫大焉。而今中国社会出版社重新出版我们的研究成果，致力于服务大众和弘扬祖国的历史文化，他们确实具有远见卓识，令人为之振奋。这是我们著者的机缘，也是读者的幸运，更有可能“走出去”，让世界人民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智道丛书》是从我泱泱中华文明之树上采撷的一批智慧之果，经由最耐得住寂寞的专家、学者的阐释、总结、提炼与升华，形成了一套关于天地、节令、宫省、君臣、治国、人际、军事、用人、饮食、服饰的中国古代智道丛书。它们自成一体，各有侧重；互相映衬、珠联璧合。这套源自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丛书，是迄今仍具活力的灿烂奇葩。它香溢神州，芳播四海。它是古代炎黄子孙的伟大创造，更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它为全人类所仰慕，理应为全人类所利用。

有感于此，是为序。

王 熹

2012年5月于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



目 录

- 第一讲 天时物候与年令节道 / 1
 四时有节与物候天象 / 2
 社会生活与节令风习 / 24
 人文景观与年节智道 / 33
- 第二讲 时空定位与历法岁时 / 41
 历法雏形与天道岁时 / 42
 月令物候与社会生活节律 / 48
 农业文明与节令智道的衍生 / 65
- 第三讲 星彗云气帛书与季时月令 / 69
 天地氤氲与节令萌芽 / 70
 《四民月令》与农事生产 / 76
 浑天仪与节令科技智道 / 86
- 第四讲 玉壶光转与宫廷年节活动 / 90
 花信风物候与令作传承 / 91
 节宴礼仪与恩荣盛事 / 99
 火树银花与节事娱乐 / 103

第五讲 祭拜游乐与民间年节活动 / 130

节气定历与科技进步 / 130

年事宴享与风俗节仪 / 139

民间年节与文化时尚 / 160

第六讲 趋时竞尚与年节文化功能 / 164

科技昌明与年节文化的兴盛 / 165

节令文化繁荣与社会生活多元化 / 178

年节文化活动的信息辐射效应 / 199



第一讲

天时物候与年令节道



中国古代的天时物候与岁时节令，源远流长，内涵宏富，其形式多种多样，与中华文明形成相始终，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使之传承相继，长盛不衰。追根溯源，中国的岁时节令活动，内涵底蕴深厚，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是中国文化发展颇具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从其发展轨迹与文化特质看，各代都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自先秦至明清时代，随着时代的推移、文明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科技的繁荣，虽然其发生了诸多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但内涵却不断得以升华，最终成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非凡气度和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各种特定的节令风俗，是在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融会历代人文智慧和发明，日益完善和定型的，其肇始和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民众的发明创造和实践过程，它不仅与古代社会各阶层的日常与年节生活、各自不同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对它们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作用，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表象的，有的是潜在的。而节令文化生活本身，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国家政务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古代统治者很会利用这样一种特有的形式和场合，以实现或贯穿其政治意图，通常的做法是颁布诏令以促农耕生产，目的是兴年节而冀治国安民；对广大民众而言，定期的节令活动，则提供了敦睦亲情、传习技艺、传播信息、交流感情、商贸往来、礼仪交际、人伦教化、祭祖祀神的最佳时机和理想场合，各种思想相互交流，得以在生产和生活领域进行实践，形成新的形态和观



念。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交替，文化的积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幅幅色彩斑斓、气象万千的节令文化与年节智道活动的生动画面，这不仅是各族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是其所独具的文化隐义的再现形态。

四时有节与物候天象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探索、共同实践、共同繁荣的历史过程，也是寻求掌握天地与人类、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文明规律的奋斗史。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证实，我们的先人们，在治水、天文历算、岁时节令、大地测量、农业耕作、制陶冶金等方面的成就，都早于西方一千多年。有民俗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所依据的时间系统主要是阴历，同时兼用阳历。这是一个兼顾日月、协调阴阳的时间框架。阴历依据月亮的弦、望、晦、朔确定月的周期，阳历依据从地表观测到的太阳的变化确定年的周期。在汉代完备起来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科学的阳历年的周期。如春节、中秋节等与月的圆缺联系在一起，夏至（端阳节）、冬至等与太阳在回归线上的来往周期联系在一起。综合太阳和月亮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确定节日的时间，能够更好地体现人与天（自然）的关系。中国人对月亮和月光的细腻感受发展为很独到的文化创造，由此积累的文化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贡献（高丙中著：《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古国之一，在科技方面，其最突出的成就是掌握了丰富的农业技术，积累了相当的岁时节令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文字记述，以及各种形态的文化遗存等，这些成为了中国无与伦比的优势。其中，若以岁时节令而论，它不仅与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农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对社会生活施加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岁时节令源于古代天文学家、历法专家的独特时空观和制订的各种历书所列的丰富内容和长期实践过程中，因此，对古人在岁时节令方面所做的探索实践、认识过程和演变情况做系统的梳理，全面而客观地总结其规律，为人们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轮廓，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和迫切，这是揭示中国岁时节令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课题，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1. 独特的时空观与古历法

中国古代独具东方特色和智慧之道的时空观，是通过历代所修订施用传承的各种历法书科学而系统地反映出来的。

历法，是人类对自身社会生产生活时间规律的一种系统而科学的编排：一种对天、人、时、空内在联系方面的探寻与掌握。各种历书和历法编制之后，是专供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作计算之用的。由于人类生存、居住、繁衍在地球上，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能量源泉，主要来自太阳，也就是说，它不过是太阳能的转换形式而已，因此，人类的各种生产、生活的运行和状况，也就必然接受太阳的支配和控制。在编订各种历书时，古人对天象最自然的认识，首先以昼夜交替的一日和寒暑变迁的一年来作为历的标准尺度，即以“日”作为短时间的单位，以“年”作为长时间的单位。但要精确知道一年之间的日数很困难，所以古人又根据太阴（即月亮）光面圆缺的变化周期作为“月”的单位。使用这样的方法，求一日、一月及一年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合人类实际生产、生活的需求，便成为所有历法在编制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了。因为历法规定了这种“年”、“月”、“日”的分配法则，所以分配方法的好坏、优劣，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都有着极为重要和深层次的影响。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年的“年”的长度，又非是一月的“月”的整倍数，不能够以12整除它，所以年、月、日的分配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而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历法，并导致了历史上多次对历法修订改革与不断完善的过程。

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使用的历法，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为“太阳历”，它是以太阳一年中运转、运动的测算为基础的；其二为“太阴历”，它是月球（太阴）光面的圆缺晦明形象的变动为基础的；其三为“阴阳合历”，它是把太阴历、太阳历两者加以调和而形成的一种历法。如果将此三种类型历法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阳历只注重太阳的运行（实际上是人类对地球运行所产生的视动而已），完全不问太阴（月亮）的运行；而阴历则仅仅注意太阴（月亮）的运行，而不问太阳的运行。尽管阴历不顾太阳的运行，却又不能不问不管一年中四季的差别，所以又有折中的历法，即阴阳合历。中国古代的历书即属于这种阴阳合历。具体详言之，所谓折中的办法，就是用设置“闰月”或采用其他算法以调和四季的差异，使季候能近于天时的实际变化动态，便于农事的耕耘、播种和收获，把握农时，适时开展生产和生活。



中国古代历法，具有很高的科技成就。它不仅是古代时空观的科学反映与记录，而且还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二十四个节气所赖以存在的科技依据和理论基础。同时，它又是中国古代节令文化与节令智道中“时”、“空”、“人”、“文”等文化要素的最真切的体现载体，是四者内在联系规律的生动反映和科学揭示。

早在中国新石器时期，不仅诞生了历法，还有了使用物候指时的记载。如在中国古代典籍《世本》中，即有“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的记载，这表明古人已非常注重观察各种天文、自然现象，并逐步掌握了天文、气象、自然之间的规律，以历法来决定一年的四季和节令，从而使得各种农事活动能够得以适时顺利地进行。《尚书·尧典》有“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说明当时确实能将一岁分为四季（即四时）；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并有闰月的安置。由于人们已对一年四季、暑往寒来的转换规律有了深切的认识，所以能保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农事活动适时、有效运作而不耽误生产生活。

在确立“年”、“月”、“日”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古代的科学工作者表现出了独特的智慧，具有很强的科学应用性。我们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历法来看，古代的科学工作者有一套严格科学的确定准则，他们的方法是：以夜半（即子夜）为一天的开始；以朔旦（就是朔）为每月的开始；而以“冬至”为一年的开始。由此可以推知，古人制历的基本观念，则以恰好是夜半、朔旦、冬至的“甲子”那天作为推算历法的起始，这叫做“历元”；除了这个标准之外，还要求“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并将它定为“上元”。其中，所谓“日月合璧”本来是日月同升的意思。古人认为这种天象很不容易遇到，故视它为祥瑞之兆，后来将它推广，只要日月同在一宫（即黄道十二宫之一）或对照（日月在相对的位置），都可叫做“合璧”。直到清代，钦天监还以“合朔”为限，即遇历书每月的初一日时，仍称做“合璧”。至于“五星联珠”，它的确切本意，是指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五个大行星同时并现于一方的意思，对此，古人也认为是难得遇见的天象，蕴含有吉祥的征兆。所以后世推广运用此种方法，并以五颗大行星各居一宫，彼此相连不断为“连珠”。但到清代的时候，钦天监却以五个大行星在经度上相距四十五度时，算作五星“连珠”之象。

为了制定历法，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要努力观测星象。他们白天用中国古代独有的天文仪器“圭表”观察太阳影子的长短，夜间则观测中星（系指过子午圈的星），以便推算冬至、朔旦能在同一天。他们还通过推算“日月合璧”发现了日食、月食的成因：即日、月在“朔”相交时，便要发生“日食”；而如果日、



月在“望”相交时，便会出现“月食”现象。同时，古代的天文学家为了推算“五星联珠”的时刻，在观察五个大行星运行的情况时，发现了五星出现的周期规律，同时掌握了五个大行星的顺行、逆行等天文现象。

从先秦至明清，通观中国古代的历法制订、测算、变革过程，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时空观念和实践活动等，则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其一，历元推算，务求精确。所谓历元推算，就是指制历专家所要求的年、月、日的实际运行周期。据朱文鑫《历法通志》、胡继勤《时间和历法》、刘金沂和赵澄秋《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等著述的研究和介绍，在中国最早的六种古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中，其历元推算的根据，非常科学和实用。其中，有岁实、章、岁、月、部、纪等专用名词，如用数学公式，可示如下：

$$1 \text{ 岁} = 365 \frac{1}{4} \text{ 日} = \frac{1461}{4} \text{ 日} = 365.25 \text{ 日 (岁实)}$$

$$1 \text{ 章} = 19 \text{ 年 } 7 \text{ 闰月} = 235 \text{ 月} = 6939.75 \text{ 日}$$

$$1 \text{ 岁} = 12 \frac{7}{19} \text{ 月} = \frac{235}{19} \text{ 月}$$

$$1 \text{ 月} = 29 \frac{499}{940} \text{ 日} = \frac{277759}{940} \text{ 日 (朔策)}$$

$$\text{又, } 4 \text{ 章} = 1 \text{ 部} = 76 \text{ 年} = 940 \text{ 月} = 27759 \text{ 日}$$

$$20 \text{ 部} = 1 \text{ 纪} = 1520 \text{ 年} = 555180 \text{ 日}$$

其中，所谓“岁实”，系指从头年“冬至”到第二年冬至的日数，它有零数；后来才知道经四年的冬至，日影才会接近原位，故以四除其总日数，得出一年的长度日数为365.25日。同时，又发现冬至十九次的日数与月朔二三五次的日数相等，于是将冬至和朔旦同在一天的周期叫做“一章”；又规定四章为“一部”，并以月数除这个日数，得出一个月的日长之数，称为“朔策”或“朔实”。此外，二十部被称为“一纪”，即到此日重复即是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将三纪作为“一元”，又称为“历元”，共4560年，若用干支纪年法，则那年的干支岁名重又会复原。由此可见其推算的精准程度非同一般，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其二，历算进步，独创新法。通观中国古代历算的进步和革新，新历法的创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历时期”，泛指汉武帝太初以前使用的古历，可惜这些古历没有传世，只能考文献的点滴记载略窥其概貌。第二阶段为“中历时期”，系指从汉代太初年间至清代初年使用的历法，



也是中国历法进行独立创作与实测造历的时期。第三阶段为“中历西法时期”，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时，中国的历法家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1629年来华传教）的“新法历书”为基础编成《历象考成》42卷，改用西洋的椭圆算法，颁定历法，在全国通用，但历的形式仍与旧历一样。第四阶段为“公历时期”，指辛亥革命以后，即自公元1912年起中国改用罗马格里哥里十三所定的历法，也就是现在国际上通用的“阳历”。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历法的第二、第三发展阶段，历法在使用中又先后经历过五次较大的改革过程：第一次在汉代，汉武帝时，因古历与天象不合，诏命议订汉历。因初制历法，不便施行，又增聘邓平、落下闳进行专门研究。邓平创制八十一分法，这是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其所制定的历法为“太初历”。第二次，是东晋咸康年间（335年—342年），虞喜认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主张天高无穷，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他在历法的改革中，发现并计算出冬至太阳位置每50年向西移动一度（现代测定为71年零8个月），即为“岁差”。到北齐祖冲之撰修成“大明历”时，首先将岁差计算在内，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第三次历法改革在唐代，唐以前的历法都用“平朔”（也称恒朔。它是根据月相变化周期的长度即朔望月=29.53059天，尽量将新月“朔”出现的当天作为初一，然后配置大月30日、小月29日），而没有考虑到日月的运行差距，只知道月份有一大一。因此，这样定出的历法存在偏差，真正的新月“朔”有时可能会出现在前一月的最后一日“晦日”、廿九日或卅日，有时会出现于初二。这种情况下，日食会出现在晦日或者初二。到唐武德二年（619年）时，傅仁均造“戊寅元历”，并采用“定朔”（指日月相合时的真实数值，各月是不等的）。第四次历法改革，是元代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于公元1281年颁行施用。第五次历法改革是清代的“时宪历”，用西洋法数，结合旧历体例而成。此外，一些王朝也曾采用过西洋历法，如唐有“九执历”，元有“万年历”等，但都使用了很短时间，就废而不可行了。

其三，不断创新，实测造历。中国古代历法的变革与创新已如前述。其中，元代郭守敬创造的“授时历”，即根据晷影，注重实测；又采用“平、立、定三差法”来推算太阳盈缩及太阴（月亮）的迟疾。授时历的数据全以实测为根据，所以较前代更加精密和科学。它以365.2425日为一年，只比地球绕日一周的实际周期差26秒，更与现在国际通用的公历（格里历）一年的周期是相同的，而又



比西洋早 300 年，其贡献非同一般。

中国古代为了提高历法的精密度，增强其实用性，有 70 余位天文学家通过实测创立新的历法，共造历 102 种，其中有的未能刊用。经过实践检验，刊用且行用年数较长的历法有：

汉代的“太初历”与“三统历”。从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出现了大的转折，全国统一历法，历法也成为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汉武帝责成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编写了《太初历》，行用 188 年。之后刘歆作《三统历》，其重要特点是年岁合一，一年的整数天数是 365 天，不再是之前所沿用历法的 366 天。以“加差法”替代“减差法”用以调整时差，年岁周期起始相当固定，用数学计算就能确定闰月，用不着“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至此，阴阳五行基本上退出了历法。之后中国历朝颁布的历法，其计算方法，与太初历大同小异。

晋代的“景初历”，杨伟编，景初元年丁巳成历，行用 180 年（265 年—444 年）。

前宋的“元嘉历”，何承天编，元嘉二十年癸未成历，行用 65 年（445 年—509 年）；“大明历”，祖冲之编，大明七年癸卯成历，行用 80 年（510 年—589 年）。

隋代的“开皇历”，张宾编，开皇四年甲辰成历，行用 18 年（590 年—607 年）；“大业历”，张胄玄编，大业四年戊辰成历，行用 11 年（608 年—618 年）。

唐代的“戊寅历”，傅仁均、崔善为编，武德二年己卯成历，行用 47 年（619 年—665 年）；“麟德历”，李淳风编，麟德二年乙丑成历，行用 63 年（666 年—728 年）；“大衍历”，一行编，开元十六年戊辰成历，行用 29 年（729 年—757 年）；“至德历”，韩颖编，至德二年丁酉成历，行用 5 年（758 年—762 年）；“五纪历”，郭献之编，宝应元年壬寅成历，行用 21 年（763 年—783 年）；“正元历”，徐承嗣编，贞元元年甲子成历，行用 23 年（784 年—806 年）；“观象历”，徐昂编，元和三年戊子成历，行用 15 年（807 年—821 年）；“宣明历”，徐昂编，长庆二年壬寅成历，行用 71 年（822 年—892 年）。

后梁的“崇元历”，边冈编，景福二年癸丑成历，行用 63 年（893 年—938 年）。

后晋的“调元历”，马重绩编，天福元年成历，沿用 5 年（939 年—943 年）；“崇元历”，边冈编，行用 12 年（944 年—955 年）。

后周的“钦天历”，王朴编，显德三年丙辰成历，行用 8 年（956 年—963 年）。

宋代的“应天历”，王处讷编，建隆三年壬戌成历，行用 19 年（964 年—982 年）；“干元历”，吴昭素编，太平兴国六年辛巳成历，行用 18 年（983 年—1000 年）。



年)；“仪天历”，史序编，咸平四年辛丑成历，行用 23 年（1001 年—1023 年）；“崇天历”，宋行古编，天圣二年甲子成历，行用 41 年（1024 年—1064 年）；“明天历”，周琮编，治平元年甲辰成历，行用 3 年（1065 年—1067 年）；“崇天历”，又行用 7 年（1068 年—1074 年）；“奉元历”，卫朴编，熙宁七年甲寅成历，行用 18 年（1075 年—1093 年）；“观天历”，皇居卿编，元祐七年壬申成历，行用 9 年（1094 年—1102 年）；“占天历”，姚舜辅编，崇宁二年癸未成历，行用 3 年（1103 年—1105 年）；“纪元历”，姚舜辅编，崇宁五年丙戌成历，行用 62 年（1106 年—1167 年）；“干道历”，刘孝荣编，干道三年丁亥成历，行用 9 年（1168 年—1176 年）；“淳熙历”，刘孝荣编，淳熙三年丙申成历，行用 14 年（1177 年—1190 年）；“会元历”，刘孝荣编，绍熙二年辛亥成历，行用 17 年（1191 年—1207 年）；“开禧历”，鲍瀚之编，开禧三年丁卯成历，行用 43 年（1208 年—1250 年）；“淳祐历”，李德卿编，淳祐十年庚戌成历，行用 2 年（1251 年—1252 年）；“会天历”，谭玉编，宝祐元年癸丑成历，行用 18 年（1253 年—1270 年）；“成天历”，陈鼎编，咸淳七年辛未成历，行用 6 年（1271 年—1276 年）；“本天历”，邓光荐编，景炎二年丁丑成历，行用 4 年（1277 年—1280 年）。

元代的“授时历”，郭守敬编，至元十八年辛巳成历，行用 87 年（1281 年—1367 年）。

明代的“大统历”，元统编，洪武十七年甲子成历，行用 276 年（1368 年—1643 年）。

清代的“时宪历”，汤若望编，顺治二年乙酉成历，行用 98 年（1644 年—1741 年）；“癸卯历”，戴进贤编，乾隆七年壬戌成历，行用 170 年（1742 年—1911 年）；“天历”，太平天国洪秀全编，咸丰元年辛亥成历，行用 14 年（1851 年—1864 年）。

其四，民族历法，各具特色。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古代历法方面，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也有很多的创造和发明。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藏历、傣历、回历、彝族历、高昌历等，历法上各有丰富内涵和民族文化特色。

藏历。西藏地区具有独特的高原气候，其物候与中原也有所不同，再加上西藏在历史上长期与世隔绝，藏族人便以自己的文化去制作历法。相传创始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之时，而确切纪年则从 1027 年起算。藏历由藏族文化固有的物候历、由印度引进的时轮历以及由汉人引进的时宪历等三大要素组成。其纪年基本和农历的干支纪年法相一致，只是用阴阳五行代替天干，甲为阳木，乙为阴木，



丙为阳火，丁为阴火，戊为阳土，己为阴土，庚为阳金，辛为阴金，壬为阳水，癸为阴水。用十二生肖代替地支。也是60年一轮回，不过不叫甲子而称为绕迥，第一绕迥从公元1027年开始，当时农历正是丁卯年，藏历为阴火兔年。藏历纪月和农历略有区别，不是以朔日为初一，而是以月圆的望日固定为十五，所以有时和农历相差一两天。藏历置闰基本和农历一样，但闰月可能放置不同，所以在闰年有时和农历相差达一个月左右。如2009年藏历新年（洛萨，Losar）是公历2月25号，与农历春节相隔1个月。星期：在上古时代，古人就以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为七曜，亦作七耀。东晋范宁《穀梁传序》中就有七曜为之“盈宿”的记载。敦煌发现的藏文卷中，七曜的名称是藏族至今通用的藏文名称，依次是：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藏历也是阴阳合历，有大、小月和闰月，岁首放在正月。

傣历。是傣族的历法。又称为小历或祖腊历，傣语称作“祖腊萨哈”或“萨哈拉乍”，是一种阴阳历。傣历开始于638年，该年为“祖腊历零年”，而639年则称为“祖腊历元年”，以此类推。傣历一年的时间为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平年是354天，闰年是384天或385天，闰年较平年多一个闰月，19年7闰，闰月固定在9月，所以闰年又称为“双九月”。月的计算则以月的圆缺为定，单月30天，双月29天，平年有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四五年间有一年闰年的八月会是30天。傣历比农历大约早三个月，农历一月的时候，已经是傣历的四月。傣历也用干支纪年，60年一个循环。“傣历”一年只分三季，即冷季（旱季）、热季、雨季。冷季从正月望日至五月的望日（相当于汉历十月半到次年二月半），热季从五月望到九月望（汉历二月半到六月半），雨季从九月望到次年一月望。它的新年不是正月初一，而是约在清明谷雨之间的泼水节。傣历的新年为泼水节，定在每年谷雨期间，即太阳进入金牛座的时期，与月相无关，所以每年泼水节在傣历六月六日和七月六日之间移动。

回历。它由穆罕默德创立于公元622年，元代忽必烈曾颁行过“回回历”。在年法上，回历有两种年法，一是太阴年法，它以朔望月为主，一年中十二月，单月为大尽三十天，双月为小尽二十九天；二是太阳年法，以太阳过黄道十二宫为主，也分十二月。其中，太阴年由于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月份与季节有差。故一月份有时是夏天，有时则是冬天。

彝族历。相传彝族曾使用过一种每年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的历法。它以十二种动物的属相来记日，每月三周，一年三十周，共三百六十天，接着过年。



高昌历。行用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是新疆地区高昌的历法。它纪年用干支，也有十二年一个周期单用地支的记法，朔日仍用平均运动步算，大小月无规律，朔望设置与中原历法也有差异和区别。

其五，置节设闰，历法独创。中国古代沿用的历法，除设置有闰月外，还缘于生产活动的需要，每年还有二十四个节气的设置，这是中国古代历法创造者科学探索的杰作，也是中国历法的一个独创。

其六，天干地支，配合纪时。所谓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系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互相配合，称为六十甲子或花甲，用它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早在殷代甲骨文中已开始应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历法的独创之一。

透过以上介绍和论述，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历法创造和实际运用，确有其自身的诸多特点：一是时空人文，皆个性独具。如阴阳五行（如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甲子干支的采用都孕育着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文明特征。二是注重历法，以应岁时。通过制订、颁施历法，从而使得时空观更为科学化、人文化、通俗化，更具有应用性和实用性。三是节闰相置，以适农事。四是天人相通，和谐相处。这些丰富的内容和历法方面的特征，在不同时期的历法中都有具体翔实的记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祀戎事大，需观天合历，否则不吉。所以其终极目标在于使之能顺天、应时，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

2. 岁时节气与物候观

一年之中“四时有节”的节气，是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对岁时气象、物候的科学认识和总结，也是古代历法重要创造之一。具体而言，节气即是将一年内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以及所引起的地面气候的演化顺序，分作二十四段；每段约隔半月时间，然后分别列在十二个月里面。其中，在每月月首的叫做“节气”，而在月中的叫做“中气”。此处所谓的“气”确指气象、气候之意。古代天文学家，在华中和华北地区经过长期观察每一个阶段内所特有的气象、物候现象之后，才最终确定出一年之中各阶段的节气名称和规律的。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有悠久的历史，为了适时安排农业生产，中国人从很早开始就重视天象的观测和节气的划定工作。现在保存在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的“周公测景（景通古影字）台”，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是